

古籍整理中训诂的应用

周大璞 黄孝德

最近,中央号召抓紧古籍的整理,这是一件具有巨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工作。整理古籍,就是对古籍进行校勘、标点、注释、翻译、辑逸和辨伪,以便古为今用,这些工作,都与训诂学的运用有密切关系。

训诂与校勘

我国的古书,在唐代以前,没有雕版印刷,全靠手抄行世。这些手抄本,文字常有讹误、衍脱,加之抄书的人水平不一,其所根据的本子也时有差异,这就需要校定。晚唐以后,发明了雕版印刷,于是产生了版本问题。版本不同,也就难免有文字讹误、衍脱等毛病。加上古代学术各有师承。师承各殊,虽然同说一经,文字亦有异同,其分章断句,也往往很不一致。东汉以后,以注附经,又出现了经注混淆的现象,或注误入经,或经混入注。这些也都要校勘,才便于后学阅读。

校勘之学,在我国由来已久,远在春秋时期就已开始了。《国语·鲁语下》:“闵马父谓正考父校商之《名颂》十二篇于周太师,以《那》为首。”后来孔子删《诗》《书》,定《礼》《乐》,所谓“删”、“定”,其实也就是对古籍进行校勘和整理。孔子的学生子夏,也长于校勘。《吕氏春秋·慎行论·察传篇》:“子夏之晋,过卫,有读史记者曰:‘晋师三豕涉河。’子夏曰:‘非也,是己亥也。夫己与亥相近,豕与亥相似。’至于晋而问之,则曰:‘晋师己亥涉河也。’”很明显,子夏指出“三豕”是“己亥”之误,就是校改讹字,他的校勘学是很高明的。但是这种校勘毕竟是偶一为之,还不是什么有计划有组织的学术活动。真正有计划有组织的校勘,是从汉代开始的。汉朝初年,图籍散乱,高祖命“萧何次律令,韩信申军法,张苍为章程,叔孙通定礼仪。”^①这里面就包括着有计划有组织的校书工作。到了汉成帝河平年间,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校书活动,在以刘向为首的专业队伍分工合作的条件下,取得了辉煌成绩。这在我国校勘学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。从此以后,校书一事越发受到人们的重视,而且逐渐和训诂合流。汉人的传注常常包含着校勘,郑玄的三《礼》注和《毛诗》笺,尤其是如此。唐人陆德明的《经典释文》也是这样。他于注音释义之外,注意做好校勘工作,把三者密切结合起来。这些都说明校勘离不开训诂,训诂也离不开校勘。因为校书要有广博的知识,特别是文字、声韵、训诂的知识,而训诂要做到精深,又非辅以校勘不可。

段玉裁《经韵楼集·与同志论校书之难》一文说:“校书之难,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,定其是非之难。”训诂的繁难正是校书中难定是非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蒋礼鸿说:“校书要通训诂,从文字的本义、引申、假借到各个时代的通俗常言的意义都需要有所了解,一经忽略,就难免致误。”^②例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下》引管仲对齐桓的话云:“垦草仞邑,辟地生粟,臣不如宁武,请以为大田”这个“仞”字,屡经校改,难得确诂,就是这种情况。对这个字最早进行校勘的是俞樾,他在其所著《诸子平议》卷二十一“垦草仞邑”条中说:“仞当作仞,谓初造

其邑也，作仞者字之误。旧注曰：‘仞，入也，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税也。’训仞为入，未得其义。《新序》载此事，正作仞邑，当据以订正”。③此后，陈奇猷《韩非子集释》采用俞说，并补充说：“王慎先曰：‘《管子·小匡篇》仞作入，即旧注所本，俞氏失考耳。’《广雅·释诂三》：‘入，得也。’太田方曰：‘仞，物也，满也。’《国策》蔡泽见逐章：‘垦草仞邑’注：仞，造也。义亦通。”奇猷案：旧注见《管子》仞作入，逐训仞为入。仞训入，古书未闻，王说从之，非是。太田方训为满，满邑类嫌强解。此当从《新序》作物。《秦策》：“大夫种为越王垦草仞邑，辟地殖谷，与此文同义可证。松皋圆引山氏说与俞说同，是。杨树达训仞为满，与太田方说同，非。”

其实，俞樾的校改是错误的，陈奇猷引俞说，又以讹传讹。蒋礼鸿《误校七例》说：‘仞’就是‘创造’的‘创’的本字。俞氏认为‘仞’是长度单位，又碰着《新序》这一异文就改了字。其实，《新序》与《韩非子》不同是传本之异。‘仞’字并不是误字，而是‘充仞’的‘仞’字之借，‘仞邑’就是使都邑充实，民物殷富，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：‘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。’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载《子虚赋》：‘若乃俶傥瑰玮，异方殊类，珍怪鸟兽，万端鳞峙，充仞其中者，不可胜数。’《文选·王融〈三月三日曲水诗序〉》：‘盈衍储邸，充仞郊虞。’又贾谊《新书·君道》引《诗·大雅·灵台》的‘于仞鱼跃’，也作‘仞’字，证据不可谓不明确，而俞氏忘却通借之例，就改错了。”蒋礼鸿的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。由此可见，不从训诂学角度下功夫，要想做好校勘工作是不可能的。

清代乾嘉之际，校勘盛行，成就巨大，如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的《广雅疏证》、《读书杂志》、《经义述闻》，俞樾的《群经平议》、《诸子平议》、《古书疑义举例》，孙诒让的《札迻》等，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。他们之所以在校勘上成绩卓著，正是因为他们都是著名的训诂学家。然而，训诂名家在校勘上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错误。这说明我们今天从事校勘工作必须更加慎之又慎，不能任意乱改古书。黄侃说：“凡轻改古籍者，非愚则妄。”④这是从事校勘者应当引以为座右铭的。

训诂与标点

古人著书，不施标点。后人阅读古籍，在书上圈圈点点，做些标识断句的工作，这就是训诂上所谓明句读的功夫，对于我们今天整理古籍来说，也是十分必要的。

古代的语文教学，也很重视这种明句读的功夫。《礼记·学记》说：“古之教者，家有塾，党有庠，术有序，国有学。比年入学，中年考校。一年视离经辨志。……”这就是说，古代很重视教育，在二十五家的闾里设有“塾”，五百家的党里设有“庠”，一万二千五百家的术里设有“序”，都城里设有“学”。名称各有不同，其实都是学校。国学年年招生，隔一年举行一次考试，头一年考试的科目就是“离经辨志”。什么叫“离经辨志”？郑玄注：“离经，断句绝也。辨志，谓别其心意所趣乡（向）也。”依郑说，离经就是断句，这是对的。但是，郑以“辨志”为辨别其心意所趋向，似乎不妥。张涤华认为辨志是辨明每段的大意，⑤我们同意他的看法。

《礼记·学记》的这一段话不仅强调语文教学的重要，而且告诉我们古人著书虽然不施标点，而古人读书却需要断句分章，以明其旨意。那么，古人断句分章，用不用一些符号呢？现在我们的标点符号基本上是近代才从外国借用过来的，古代当然没有，但古代也自有一些常用的符号。近人吕思勉所著《章句论》对此曾有精当的考证，这里节录一段：

章句之期，则今符号之类耳，何以言之？案《说文》，“章之义为‘乐竟’，则章本乐曲之名。故左氏已有‘扬水卒章’之言，《曲礼》亦有‘丧复常读乐章’之语。引而申之，则凡陈义已终，说事已具者，皆得谓之章。《系辞传》所谓易六画而成章也。又《说文》‘句’下云：‘曲也’。‘钩’下云：‘曲钩也’。‘丿’

下云：“钩，逆者谓之‘丿’。”“丿”下云：“钩，识也”。四字音近义通，后虽殊文，始实一语，钩识之丿，即章句之句。段氏曰：“章句之句，亦取稽留可钩乙之意，古音总如钩。后人句曲音钩，章句音履，又改句曲字为句，此浅俗分别，不可与道古也。”又曰：“钩识者，用钩表识其处也。褚先生《补滑稽传》：‘东方朔上书，凡用三千奏牍。人主从上方读之，止，辄乙其处，二月乃尽。’此非甲乙字，乃正丿字也。今人读书有所钩勒，即此。……”予案《说文》“、”下云：“有所绝止而乙之也。”尺下云：“从尸从乙。乙所识也。”此乙亦钩识字，非甲乙之乙。（‘钩识也’三字，当如王氏《句读》之例，以钩字为一读，谓为表识之曲形也。为表识之曲形，以丿象之。书写形状小异，即成乙。）然则、与丿并古断句之符号矣。章句二字，本义如此。知古所谓章句者，实后世画段点句之类。故《论衡》谓“文字有意以立句，句有数以连章，章有体以成篇”也。（《正说篇》）。⑥

表示分章断句的符号，宋代以后，除丿与、以外，还有不少，请参看《张涤华语文论稿·驳胡适关于标点符号起源的谬说》。

现在既有新的标点符号可供我们使用，用不着再去研究那些老古董了，我们应该讨论的是怎样使用新的标点符号，练好明句读的基本功。这件事看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很困难，因明句读和讲训诂有密切联系，不精通训诂，就不能保证句读没有错误。黄侃说：“研治先秦古籍，分必自分析章句始”。⑦其实不只研治先秦古籍应该如此，就连明清人的文章，也何尝不应该先析它的章句。近来出版的明清人著作，标点错误的就不少。这里只举一例：

常璩《华阳国志》于林、闾、翁、孺、杨、庄并云见杨子《方言》。李善注《文选》，引张伯松曰：“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。”亦直称杨雄《方言》曰：“可证歟，雄遗《答书》附入《方言》卷末已久”。⑧

这短短的三句话，就有三处用错了标点符号。第一句，林闾翁孺是一个人（此人复姓林闾，名翁孺），被标点成四个人；杨庄也是一个人，被标点成两个人，当然都错了。第二句，是说李善《文选》引附在《方言》卷末的杨雄《答刘歆书》中所记张伯松的话，也直称《方言》曰，“曰”字下当加句号，今作冒号，后面又标引号，也错了。第三句本是戴震的话，标点者误以为杨雄之语，真可谓张冠李戴。又“歟雄遗答书”指刘歆《遗杨雄书》和杨雄《答刘歆书》，书名号应加在“遗答书”三字处，今只加在“答书”二字处，又是一个错误。看来这三处错误都不能归咎于排字工人，而是标点者没有弄清文意，如果加强训诂的学习，这类错误有许多是可以避免的。

训诂与注释

注释古书，要有训诂学知识，是不言而喻的。郑樵在论述传注时曾经说过：“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，非惟书之理意难明也，实为事物难明也。非为古人之文言难明也，实为古人文言有不通于今者之难明也。能明乎《尔雅》之所作，则可以识笺注之所当然。不明乎《尔雅》之所作，则不识笺注之旨归。”⑨郑氏深知注释古书困难之所在，提出要以古代训诂著作作为依据，运用训诂学的原则和方法，通过注释，说明古书中的事物，说明古人语言中为今人难以明了的地方。郑樵推崇《左传》的杜预集解和《汉书》的颜师古注，认为这是两部有特色的注释文字。他说：“颜氏所通者训诂，杜氏所通者星历地理。当其颜氏之理训诂也，如与古人对话，当其杜氏之理星历地理也，如羲和之步天，如禹之行水。然亦有所短，杜氏则不识虫鱼鸟兽草木之名，颜氏则不识天文地理。孔子曰：‘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’杜氏于星历地理之言，无不极其至，至于虫鱼鸟兽草木之名，则引《尔雅》以释之。颜氏于训诂之言甚畅，至于天文地理则阔路焉，此为不知为不知也。”今天，我们为古书作注释，杜预解《左传》和颜师古注《汉书》的经验，还是有借鉴意义的。现在，有些古书的注释错误较多，仍然在古事不明，古语不通而强作解释这两个问题上。从根本来说，仍然是缺乏训诂根底。例如最近上海出版《宋诗

一百首·邵定翁(插图)》：“邱嫂拔秧哥去耕”注“邱嫂，阿三的嫂子，姓邱。”这是不明古事而造成的误释。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：“高祖微时，尝与宾客过其丘嫂食。”颜师古注引张晏曰：“丘，大也，长嫂称也。”丘、邱古字通。邵定翁的诗用此典故，其中的“邱嫂”即大嫂。注者不知，望文生训，误释为姓邱的嫂子。⑩

又如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《语文·西门豹治邺》：“洗沐之，为治新衣，闲居斋戒。”注：“〔闲居斋戒〕古时举行祭祀，先要斋戒(包括沐浴、更衣、素食、独居等)，表示对神的恭敬。”这是一种没有划清古今词义界限的误释。

“斋”又叫“斋戒”，在古籍中是个常用词。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：“虽有恶人，斋戒沐浴，则可以祀上帝。”《国语·周语上》：“王即斋宫，百官御事，各即其斋三日。”《礼记·祭统》：“及其将齐(斋)也，防其邪物，讫其嗜欲，耳不听乐，故记曰，齐者不乐，言不敢散其志也。心不苟虑，必依于道。手足不苟动，必依于礼。”从这些记载看，“斋戒”作为一种祭礼，是有许多讲究的，包括沐浴、更衣、节制嗜欲等正心洁身的要求。但是，并不要求素食。相反，古人斋戒，还强调肉食。因为只有吃肉多，才能精神旺盛，胜任斋戒时诸多的体力活动。《周礼·天官冢宰·膳夫》：“王日一举鼎十有二，物皆有俎。”郑玄注：“杀性盛饌曰举。王日一举，以朝食也。”又：“王斋日三举。”郑司农云：“斋必变食”。孔颖达疏：“斋必变食，故加牲体至三大牢。”就是说，到了斋戒之日，不光是朝食要杀牲，而是一天要杀三次牲，早、中、晚都要变化着花样吃肉。把“斋戒”与素食联系起来，是佛教盛行以后的事。佛教是在西汉以后传入中国的，而《西门豹治邺》这一文中所反映的语言事实则在西汉以前，因而其中的“斋戒”是不可能要求素食的。注释者正是由于不明白“古人之言有不通于今者”，因而作了错误的注释。⑪

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到，为了提高注释质量，学习和运用训诂的知识是何等重要。

翻译有两种：一是国外语或外族语译为汉语，一是把古语译为今语。前者始于先秦。《礼记·王制》：“五方之民，语言不通，嗜欲不同。达其志，通其欲，东方曰寄，南方曰象，西方曰狄鞮，北方曰译。”可见当时已经有专管翻译的官。东汉以后，佛教传入中国，于是翻译佛经的逐渐多起来。明清以后，又有翻译西学的。这两种翻译对我国文化都起过很大的影响。这里无须多说。

后者起源也很早，远在西汉时代，司马迁撰《史记》，就运用了这种翻译的办法。他采用了很多古代流传下来的史料，如《尚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等等。这些史料中，有些传世久远，文字佶屈聱牙，很不容易读懂。为了便于人们阅读，他就不照原文记录下来，而是运用“以训诂代经文”的原则来改写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也就是古语今译。具体地加以分析，大致有以下四种方法。

(1) 取同义字代替，如《尚书·尧典》：“钦若昊天。”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作“敬顺昊天。”以“敬”代“钦”，以“顺”代“若”。“钦”与“敬”，“若”与“顺”，皆同义。又《尧典》：“庶绩咸熙”《五帝本纪》作“众功皆兴”。“庶”与“众”，“绩”与“功”，“咸”与“皆”，“熙”与“兴”皆同义。

(2) 取音同、音近、音转的字代替。如《尧典》：“协和万邦”《五帝本纪》作“合和万邦”。“合”、“协”音近义通。又《尧典》：“平章百姓”《五帝本纪》作“便章百姓”。“便”、“平”一声之转，古通用。

(3) 取常用字代替冷僻字，如《尧典》的“瞽子”，《五帝本纪》作“盲者子”。又《尧典》的“不格奸”，《五帝本纪》作“不至奸”。

(4) 增字以足意，如《尧典》：“有能俾乂”，《五帝本纪》作“有能使治者”。又《尧典》：“试可乃已”，《五帝本纪》作“试不可乃已”。清人钱大昕说：“古人语急，以不可为可也。古经简质，得

史公而义益明。”⑫

现在，为了批判继承我国的文化遗产，也需要组织一大批熟悉古汉语的人来翻译古籍，这个工作很重要也很艰巨。

翻译古书，和翻译其他著作一样，要求做到严复所提出的信、达、雅。信，就是要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意旨，不允许添加或减少以致歪曲原文的意思；达，就是不但译出原作词句的意义，而且要文字通畅；雅，就是要使译文符合汉语规范，具有一定文采。这就要译者既要精通训诂，又要有当代语言的修养。只有博古通今，才能胜任古籍的翻译工作。现在，有些古籍的今译错误较多，原因很复杂，而缺乏训诂的功力是主要的。下面举两人例子来说明。

最近上海出版的《明清笔记故事选择·秦淮健儿传》中有一段描写秦淮健儿臂力过人的故事。原文是：“（健儿）乃至父兄前，以两手擎父兄两胫，去地二尺许。”这段话被这个选本断句为：“乃至父兄前，以两手擎父兄，两胫去地二尺许。”译文为“就走到那人跟前，用两只手把他举了起来，使他两条腿离地有两尺多高。”

这段译文在训诂上有三个毛病：一、错把“父兄”译为“那人”，把复数变成了单数；二、把“以两手擎父兄两胫，去地二尺许”误断为“以两手擎父兄，两胫去地二尺许。”三、“二尺许”译为两尺多高，也不妥当，当译为两尺来高。就是这三点错误，弄得整个译文似是而非。⑬

又如同一篇文章中，还有一段描写秦淮健儿与人饮酒比赛，误伤人命的故事。原文是：“与○友饮，酒酣斗力，毙之。”被这个选本误断为：“与僚友饮，酒酣，斗，力毙之。”译文是：“有一次，跟一个同事喝酒，喝醉了，打了起来。健儿一用力，就把那人打死了。”其实，原文的意思是：健儿与同事一起喝酒，喝到高兴时，就一起比赛，看谁的力气大，谁料下手过猛，竟把那位同事打死了。

这一段译文，除了句读的错误外，还把“酒酣”误译为“喝醉了”；又误将“斗力”一词强行分开，把“斗”误译为“打了起来”；把“力”误译为“健儿一用力”。一段只有十几个字的文章，出现这么多误译正是译者缺乏训诂功力的表现。⑭

总之，训诂与翻译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，为了改进古文今译的工作，也需要认真学习训诂学的知识。

训
诂
与
辑
逸

辑逸就是搜辑、整理已经全部散逸或部分散逸了的古籍，企画恢复原书的面貌。这个工作是从宋代学者开始的。章学诚《校雠通义·补郑篇》说：

昔王应麟以《易》学独传王弼，《尚书》止存《伪孔传》，乃采郑玄《易注》、《书注》之见于群书者，为《郑氏周易》、《郑氏尚书注》。又以四家之《诗》，独《毛传》不亡，乃采“三家诗说”之见于群书者，为《三家诗考》。嗣后好古之士，踵其成法，往往缀辑逸文。搜罗略遍。

而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则以为“辑刻古书不始于王应麟”⑮。在王氏以前，已有人辑出了《相鹤经》。但其人也是宋人，因此说辑逸始于宋人，是站得住脚的。

到了清代，辑逸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，清高宗编定四库全书，不特广收海内藏书，还派员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一大批逸书，计经部六十六种，史部四十一种，子部一〇三种，集部一百七十五种，共三百七十五种，四千九百二十六卷。后来私人所辑的逸书也有很多，如马国翰的《玉函山房丛书》辑周秦至隋唐逸书六百种，张澍的《二酉堂丛书》辑汉魏逸书三十六种，黄奭的《汉学堂丛书》辑经书八十五种，纬书五十六种，子史七十四种，附《高密遗书》十四种。

这些书，辑自各种古籍，其中以类书为多，但也有不少是从汉唐人注疏中辑出的，因此。

辑逸是和训诂分不开的，而且要做好辑逸工作，必须精通训诂，熟悉古代的注疏，没有这种根底，辑逸是无法进行的。

训诂与辨伪

辨伪就是辨别古籍的真伪。我国的古籍向来有真有伪。清末张之洞在《輶轩语》中说过：“一分真伪，而古书去其半。”这也许是过分夸张，但他提醒我们要善于辨别古书的真伪，不要把假古董当做宝贝。

当然，伪书也是多种多样的，有的伪在作者依托前人以自重，而所依托之前人实未尝撰此书，如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·小说家》有《伊尹说》二十七篇，注云：“其语浅薄，似依托也。”又《农家》有《神农》二十七篇，注云：“六国时，诸子疾时怠于农业，道耕农事，托之神农。”这一类书虽是后人所依托，其内容亦多浅薄，但其中也不乏优秀的著作，如医经类有《黄帝内经》十八卷，亦见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此书的作者当然也出于依托，但确是一本好书，所以一直流传至今。

有的伪在委托别人为已著作，书成之后，又署自己姓名。如《尚书今古文疏证》本是毕沅命江声替他写的，直到现在出版的本子，其作者的名字仍然是毕沅，而不是江声。这一类的书中也有好的，《尚书今古文疏证》就很好。

有的伪在盗窃别人著作以为己有，如郭象的《庄子注》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篇》：“初，注《庄子》者数十家，莫能究其旨要。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，妙析奇致，大畅玄风。惟《秋水》、《至乐》二篇未竟而秀卒。秀子幼，义遂零落，然犹有别本。郭象者，为人薄行，有俊才，见秀义不传于世，遂窃以为己注。乃自注《秋水》、《至乐》二篇，又易《马蹄》一篇，其余众篇，或定标点句而已。后秀义别本出，故今有向郭二《庄》，其义一也。”

有的原书散逸，别人因此伪造一本，冒充原书，如《古三坟》一书就是这样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易类存目四》：“案《三坟》之名，见于《左传》。然周秦以来，经传子史，从无一引其说者。不但汉代至唐，咸不著录也。此本，晁公武《读书志》以为张商英得于比阳民舍，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以为毛渐得于唐州，盖北宋人所为。其书分山坟、气坟、形坟，以《连山》为伏羲之《易》，《归藏》为神农之《易》，《乾坤》为黄帝之《易》。各衍为六十四卦，而系之以传，其名皆不可训诂。又杂以河图代姓纪及策辞政典之类，浅陋尤甚。至以燧人氏为有巢氏子，伏羲氏为燧人氏子。古来伪书之拙，莫过于此。故宋元以来，自郑樵外，无一人信之者。至明何鏞，刻入《汉魏丛书》，又题为晋阮咸注，伪中之伪，益不足辨矣。”

有的书本是真品，但其中有后人增加的成分，因此也被认为伪书。如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·道家》有《太公》二百三十七篇，注云：“吕望为周师尚父，本有道者。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。”按注文有误，疑注末当为“或又以世有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。”也就是说，这二百三十七篇并非都出自太公之手，其中有些是后人加进去的。又小说家有《鬻子说》十九篇，注云：“后世所加。”也是指出《鬻子说》中有后人加进去的内容。

至于辨伪的方法，也是多种多样的，这里只谈运用训诂来辨别古籍的重要性。制造伪书者往往要模仿原著，力求在遣词造句乃至文章风格上酷似原著，这样才能以假乱真。但是这种模仿很不容易做到家，在细心人的眼里，总会露出破绽来。细心人要找出伪书的破绽，当然也有种种方法。一般说来，运用训诂来研究伪书的遣词造句和行文风格，是辨伪者常常要采用的一种有效的办法。让我们从清代阎若璩的《尚书古文疏证》的第五十六条摘录一段为例：

又余向谓文有承讹踵谬，千载莫知其非，而一经道破，真足令人笑者，不独《大禹谟》之于《左传》，抑且见《五子之歌》之于《尔雅》矣。《尔雅·释诂篇》：“郁、陶、繇、喜也。”郭璞注引《孟子》曰：“郁

陶思君。”《礼记》：“人喜则斯陶。陶斯咏，咏斯犹。”“犹”即繇也。邢昺疏，“皆谓欢悦也。郁陶者，心初悦而未畅之意也。”又引《孟子》赵氏注云：“象见舜正在床鼓琴，愕然反辞曰‘我郁陶思君，故来。’尔，辞也。忸怩而惭，是其情也。”又引《下檀弓》郑注云：“郁陶也。”据此，则象曰：“郁陶思君尔”，乃喜而思之辞，故舜亦从而喜曰：“惟兹臣庶，汝其予于治。”孟子固已明下注脚曰：“象喜亦喜，”盖统括上二段情事。其先言“象忧亦忧”，特以引起下文，非真有象忧之事。大凡凶恶之人伪为忧尚易，伪为喜实难，故象口虽云然，而色则否。赵氏注一段，颇为传神，伪作古文者一时不察，并窜入《五子之歌》中，曰：“郁陶乎予心，颜厚有忸怩。”不特叙议莫辨，而且忧喜错认，此尚可谓之识字也乎？历千载人亦未有援《尔雅》以正之者，抑岂可独罪伪作者？噫，余盖不敢深言矣！

这一段揭穿《伪孔传》的作者不学无术，承讹踵谬，不知道《尔雅》有“郁、陶繇，喜也”的雅诂，而于《尚书·五子之歌篇》释“郁陶”为哀思。从这两个字的解释，就可以证明《伪孔传》绝不出自孔安国之手。由此，又给我们启示：要辨别古书的真伪，就必须精通训诂学。

注释：

- ① 见《史记·自序》
- ② 见蒋礼鸿《误校七例》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一次年会论文油印稿）
- ③ 按：四部丛刊本《新序》卷四：“管仲言齐桓公曰：‘夫垦草初邑，辟土殖谷，尽地之利，则臣不若宁武，请置以为田官。’”与上引文稍异。
- ④ 见《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·前言》。
- ⑤ 见《张涤华语文论稿·驳胡适关于标点符号起源的谬说》
- ⑥ 《章句论》见吕思勉著《文字学四种》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—8页。
- ⑦ 见《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·前言》。
- ⑧ 见《戴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月版，第202页。
- ⑨ 见郑樵《通志·卷三十六·艺文·春秋左氏传》。
- ⑩ 此例采自刘世南《谈古文的标点、注释和翻译》一文，见《中国语文》1979年4期。
- ⑪ 参见马振亚《词义训诂质疑举例》，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二次年论文油印稿。
- ⑫ 关于《史记》古文今译问题，请参见张舜徽《中国文献学》174—175页，陆宗达《训诂简论》159—180页。
- ⑬⑭ 参看刘世南《谈古文的标点、注释和翻译》。
- ⑮ 见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卷八《辑刻古书不始于王应麟》条。

后记：

本文为周大璞主编《训诂学初稿》中的一节，该书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。本次付排，略有改动。